

美国华人

冷战后华人移民的跨国民族主义^{*}

——以美国华人社会为例

吴前进

(上海社会科学院 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上海 200620)

[关键词] 冷战; 华人移民; 民族主义; 跨国主义

[摘要] 冷战后, 跨国主义、民族主义方兴未艾, 而国际移民,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移民及其民族主义产生与表现正在成为移民研究的一个新视点。本文以美国华人社会为例, 运用跨国主义的分析视角, 探讨冷战后华人民族主义掀起的背景、主体、特征、局限与前景, 从而说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群体征象之于中国与居住国的双重影响和多种意义。

[中图分类号] D634.3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6)01-0018-12

Migrants, Na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A Case Study on the American Chinese

WU Qian-jin

(Institute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Key words: Post-Cold War; Chinese migrants; nationalism; transnationalism

Abstract: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has witnessed a new wave of na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surging in the world. With mo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 migrants, particular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ir inclination towards nationalism and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movement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new topic in terms of migration studies. Tak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收稿日期] 2005-08-30

[作者简介] 吴前进, 女, 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当代海外华人及其与国家关系的研究。

* 有关“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 著名历史学家王康武教授曾予以精辟阐述, 笔者深受启发, 写就“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一文, 详见拙著《国家关系中的华侨华人和华族》(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年7月版, 第351-364页)。本文试图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 从跨国主义的分析视角重新理解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此外, 部分有关移民问题的跨国主义论述, 亦可参见拙作《当代移民的本土性与全球化——跨国主义的视角分析》, 北京《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8期, 第18-24页。必须指出的是, 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 在本项研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 指辛亥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两次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浪潮, 其指归在认同祖(籍)国的祖国民族主义者; 第二, 指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三波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浪潮, 即当今的海外华人跨国民族主义浪潮, 其指归在认同祖(籍)国和居住国双方的“民族”。辨别这一点, 旨在说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演进方向和时代内容。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major players, characteristics, limitations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ism. The author is intended to show how a double impact and multiple implications brought about by the nationalism maintained by Chinese overseas as a group could be clearly sensed both in China and the host societies overseas.

冷战后，跨国主义、民族主义方兴未艾，而国际移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移民及其民族主义倾向与表现正在成为移民研究的一个新视点。美国作为当代多民族和谐相处比较成功的国家，移民在这里既可以在政治共同体中表明自己的公民归属，又可以在民族共同体中表明自己的文化归属；既可以与主流社会亦步亦趋，实现所谓的“美国梦”，又可以找到类似家园的感觉，在母体之外参与“想象的共同体”和祖国回归运动。有鉴于此，本文运用跨国主义的分析视角，以冷战后美国华人社会的新移民群体为例，探讨华人跨国民族主义之于祖籍国和居住国的影响、意义以及华人跨国民族主义之于国家、地区和全球的可能模式和基本局限，以说明跨国移民在构成对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理论挑战和冲击的同时，也显示出其作为跨文化、跨国界的民族联合体在国家之间以及区域内的角色作用问题。

一、跨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华人跨国民族主义

跨国主义 (Trans-nationalism)，属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所采用的术语，以后也用于解释跨边界的人口流动，成为研究移民问题时所采用的一种比较时兴的研究方法，用以检视全球化进程中承载文化的人口流动及其相关结果。其含义指：“移民形成与维系的多重的联结原籍地与定居地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进程”。它强调当代移民建立了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边界的社会场 (social fields)。跨国主义因此成为“将民族国家疆界之外的人民与机构连接起来的多重关系和互动”。^[1]然而，按照常规的标准来看，现有的跨国主义研究，并不构成一个学科。相反，它由许多学科的共同贡献而形成，如国际关系、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具有跨学科的交叉特性。就跨国研究 (Transnational Studies) 本身而言，它主要用于研究国际关系的情景中。随着国际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的增长，跨国研究显示了它的历史意义，即“Trans”不同于“Inter”，其关系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公民之间，这种不同的关系也存在于政府及其代表之间。在跨国关系中，边界是被超越的，而非由政府代表所维持或让渡。^[2]由此，小约瑟夫·奈认为：“自由资本主义在冷战以后所面对的重要挑战者和竞争对手是族群民族主义 (ethnic nationalism)”，“在可见的将来，跨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相互作用是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3]

民族主义 (nationalism)，又称“国家主义”、“国民主义”，大体表现为民族共同体成员在民族意识基础上形成的对本民族的忠诚和热爱，认为自己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致力于促进民族利益和提高民族文化，对抗其他民族的利益和文化，属于一种为维护本民族生存和发展权益所作的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同时，民族主义思想中包含着把民族与本民族的政治统治者视为一体来加以维护的功利因素。民族精英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常常以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来加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国家的正当性，进而构成现代民族。也因此，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要与民族主义相伴而生，属于现代历史和政治思潮发展的产物。其表征与国家相联系，并以此来确定疆土、人口和主权从而构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换言之，若脱离了“国家”这一概念，“民族”就丧失了它的历史起源而无所依归。迄今为止的现代国家基础依然是民族。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构成现代国际关系的主体和国家体系划分的基础。^[4]

由于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中，民族是一个综合性的集合概念，超越种族、语言和宗教，

因而其内在规定性便与建构民族国家的要求——地域、人口和主权相吻合。在此，民族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具有国家背景的所谓政治民族，此种民族是放在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的，相当于英语中的 nation；二是指国家内部以种族、语言、宗教信仰等不同背景相区分的人类集团，相当于英语中的 ethnic groups, people 等，具有文化民族的含义。以此观之，民族问题就包括两方面内容：其一是政治民族之间的关系，即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一国内部的民族关系，即文化民族或族群之间的关系问题。^[5]与此相应，与民族相关的民族主义也拥有两个不同层面：既有国家层面的民族主义，也有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冷战期间，华侨华人在居住国所面临的便是这样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必须认同当地民族，成为居住国民族构建中新民族的一部分，共同对外；另一方面，他们又成为居住国主体民族同化的对象和当地民族主义者攻讦的目标，构成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冷战的结束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催生了民族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民族主义的跨国性，或跨国的民族主义，伴随着跨国移民的不断产生和“移民时代”的到来而成为一个重要现象。跨国主义的文献研究因此强调，外来移民的跨国民族主义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跨边界的祖国民族主义 (transborder homeland nationalism)，指虽身居海外，却具有本民族的认同。移入民的政治跨国主义通常就是祖国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双重民族主义 (dual nationalism)，指认同两个截然不同民族的政治认同。双重民族主义者声称自己从属于输出国和接受国双方的“民族”。^[6]

如今，这种政治民族主义的跨边界认同和双重认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移民个人和群体视为当然。许多人相信，“跨国的公民社会和国际性公共领域正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所有的男男女女将学会在不放弃自己的价值和信仰的情况下尊重并试图理解别人的价值和信仰，进而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批判地评估不同的价值和信仰并‘重新发明’它们。”^[7]在这一过程中，移民个人和群体与原有的“族群”（对某个特殊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的联系不会被削弱。进而言之，跨国移民的行为、关系呈现为：身居“这儿”（居住国），却对“那儿”（祖籍国）表现出特有的关切，他们属于“既在这儿，也在那儿”——其“行为—关系”连接起居住国和祖籍国双方的——跨身份的一群，具有现实空间和想象舞台的综合能力。

故而，跨国民族主义，作为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的一种跨地方表现形式，以移民共同体为载体，具有族群民族主义 (ethnic nationalism) 和公民民族主义 (civic nationalism) 的双重特征和共同力量。它超越了狭隘的族群民族主义情结，而结合了更具理性的现代公民民族主义内容。以此来看，跨国民族主义就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它具有族群民族主义的属性，其召唤力来自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丰富的文化蕴涵，它追溯过去，展现群体身份的连续性，给人以牢固可靠的归依感。^[8]第二，它强调公民民族主义的主旨，提倡在民族国家之内，容纳不同民族或族群的多样性，公民在政治上效忠他们的国家而不是他们所属的族群，以公民的整体性原则来消解族

“族群民族主义”，又称“族裔民族主义”，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概念。纵观历史，它从强调血缘、人种和语言等因素，逐渐转向某个特定族裔的传统与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特别是在它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经济规模的扩张，人口流动的增加以及教育的普及使得家族、血缘等生物学意义上的标识日趋淡化，而彰显人类社会意义的文化却愈益凸显出来。因而，族裔民族主义者所认同的文化是族裔共同体经过人为选择、加工，抑或虚构出来的东西。见戴晓东：《浅析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北京：《现代国际关系》2002 年第 12 期，第 58 页。

公民民族主义，是一个政治层面的概念，指建立在共同的契约、义务、忠诚和爱心基础之上的，承认相互间平等的公民权利的共同体认同精神。公民民族主义的共同体可以容纳各种文化背景的个人，只要他们达到了法定年龄。或者，如果他们是外来移民，只要他们宣誓效忠其移居地的政府并认同其移居地的生活方式。见单纯：《论中国人的“天下民族主义”》，北京：《世界民族》2001 年第 2 期，第 12 页。

群的多样性分歧。^[9]也就是在统一性的前提下表达多样性，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实现统一性。基于此，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人少数民族族群，在解决了居住国的政治认同身份，成为华族（ethnic Chinese）之后，其文化认同亦在冷战后时代开始获得新的生命力，特别是随着华人新移民在祖（籍）国和居住国的来回穿梭，跨国移民建构了全球化时代作为移民散居者（Diaspora）的行为、关系与制度特征，他们把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通过流动的个人而连接了起来，从而成为“华人散居者”（Chinese Diaspora），并促成其在新时代的意义。

值得辨明的是“散居者”（Diaspora）的概念。在这里，“散居者”主要指今天任何移居在移民接受国，并且拥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民族、种族群体。它与那种被认为是“地理上居住在祖国之外，心理上从属于祖国的海外居住者”的涵义有所不同。确切地说，和许多华人问题研究者一样，笔者亦不认同那种把华人移民称作“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移民散居者之谓。故而，本文沿用的“华人散居者”概念，仅用来说明海外中国血统人称呼在当代变迁的一个结果，且以此区分当代移民与传统移民所具有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关系类型和制度特征。

因此，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华人散居者”（Chinese Diaspora）概念在本项研究中所应表达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居住在母国之外的移民个人和群体，其行为方式日益呈现为价值理念多元包容和情感趋向彼此兼顾。在此过程中，通过在母国和居住国之间的远程互动，移民在跨国网络中实现社会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民族国家对于移民运动也有了重新认识和制度安排，从而为移民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拓宽了新的可能途径。也就是说，“华人散居者”的概念内涵，不再囿于或被设定于旧有的巢臼。事实上，对于此一概念的提升、把握和分析，有助于认识华人散居者如何在融入居住国的同时，重新参与想象中的回归运动，并体现其祖国民族主义情怀。也有助于认识作为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散居者，他们如何把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关系建构到全球化的动态网络系统中，进而有效地把祖籍地和居住地资源结合起来，实现政治推动、经济互补、文化交流和价值共享。此外，他们与1965年以前的老一辈华人移民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地方，而这种不同通过国家、地区和全球等多个层面表现出各自崭新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指称的具有跨国民族主义倾向的华人散居者，虽然是海外华人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人士和知识精英，但他们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化论者所认为的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往往倾向于认同当地而渐渐疏远了自己祖国的移民不同，当今的跨界移民，正是由于其良好的知识背景，便利了他们更加倾向于成为跨国民族主义的实践者和鼓吹者，从而显示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内容特征。

“Diaspora”在英语中适用于犹太人，有四个特征：一是指其流离失所和散居异乡；二是具有集体受害经历，与居住国存在矛盾；三是具有群体精神，如共同经历、背景和文化，可在跨国基础上形成集体认同；四是积极参与想象中的回归运动。Diaspora，是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文化研究理论，被视作是对移民、放逐者、流亡者、客居工人、背井离乡者和族群区落等经验的调用。它通常意味着一种距离，与有密切关系的出生地的分离和被驱逐，并被禁止回返。此一概念被认为与少数民族和移民有关，与跨国界的认同、记忆和渴望跨越时空的经验等相联系。See John Docker's paper on “Reconceptualising the Southern Chinese: From Community to Diaspora”,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http://rspas.anu.edu.au/cscsd>, 27 February 1999.

2001年初，针对大量有关“Chinese Diaspora”的著作和言论，王赓武教授给予了这一词语以全方位的否定、批评和谴责，认为它已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旨意，而更多地被赋予了政治性的内容，被视作与“中国威胁”有关的负面暗示。为此，他强调“Diaspora”的含义仅仅存在于涉及排他性的概念运用之中，只是一个有关移民的想象物，一种感觉而已，绝非真实存在。See Wang Gungwu, “Diaspora, a much abused word.” Asian Affairs is published by Oriental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Hong Kong SAR, No. 14, Winter2000/2001, pp. 17, 19 - 20.

“海外中国血统人”称呼，自中国近代以来，历经了从“华侨”（overseas Chinese）到“华人”（Chinese overseas）到“华族”（ethnic Chinese）的不同阶段，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法律与文化涵义。参见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

二、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

冷战后，华侨华人与祖籍国和居住国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而最先对这种改变内容与方式进程予以评价并小心翼翼地指出新时代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崛起以及由此可能在东南亚地区形成潜在忧虑的是权威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10] 1996年7月16日，时任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主席（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的王赓武教授在冷战后民族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专门就民族主义与海外华人的关系演变作了极富学术性和现实性的“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专题演讲。其主旨在回顾、揭示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历史分期和今后走向的同时，也为东南亚学者中普遍存在的忧虑与揣测，即今日的“海外华人会不会响应中国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效忠大中华？或将文化中国变成支配性的新东亚文明？”，重新给予提示、分析和展望。那就是，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进程早就为海外华人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事实和答案：海外华人与中国的渊源虽然生生不息，此起彼伏，但二者的结合从未演变成地区中的支配性因素，或主导东亚文明。冷战后，由于新华侨华人的出现而形成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在新时期的张扬，既有民族主义的固有内容，又有国际政治的因素作用。因此，重新解构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无疑有助于认识新华侨华人与中国和居住国的情感联系及其未来走向。

民族主义作为理解民族集体认同形式的前提，将民族与国家作为共同演进、期待的政治目标，从而将民族与国家连为一体。一般来看，民族主义可以分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属于民族主义兴起的早期显著标志，其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政府。这在冷战期间的东南亚国家表现得十分明显，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历史上看，政治民族主义时代至冷战后已基本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经济民族主义，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倡导的以经济独立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它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也有表现，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个别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抵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和拯救措施时，表现较为明显。而文化民族主义则指民族主义中那些强调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因素，主张以同质性的文化传统为纽带，力图建立以民族认同为单位的文化空间。^[11] 冷战后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表现出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

众所周知，海外华人与民族主义的渊源漫长，起起伏伏，迄今不绝。作为一种特定的民族一体性意识，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特别表现为渴望并促进祖籍国民族自由、强盛和繁荣的共同性。它与一般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这一群体边界的模糊（分散在各居住国，未有固定的疆域）、人数的不定（依据社会动员的广度而不同）和主体的限定与待定（前者指与中国关系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群，后者指海外华人本身身份认同因时因地而异）。正因如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内涵须屡屡有所界定，以避免有意无意的附会和不必要的敏感与误解。

就海外华人本身而言，由于该群体独立于祖籍国之外，属于居住国的少数民族，因而其民族主义的缘起一方面取决于祖籍国的情感动员，另一方面其可以动员的广度与深度皆与居住国的民族政策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它既是中华民族情感主观的自觉，又处于居住国生存背景的客观情景限定之中，若脱离了“中国因素”的外部条件刺激以及居住国对于这种华人民族主义在海外延伸的容纳，则片面而单纯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无从凭说。以此角度考察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发生，则可以说，作为居住国的少数民族，对外，它不可能如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那般具有扩张性；对内，亦不具有主体民族那种强大的分裂性。同时，由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主要在于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关于民族群体的自我意识，因此又决定了它的组织性的短暂，故而往往不易发展成势力庞大且极富挑战性的泛民族主义。此外，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

早期兴起的大背景来看，由于它具有东方民族主义的表现特征，即它是在反帝、反殖过程中勃兴的一种身处居住国（或居住地）而又对于祖籍国的国家发展和民族责任怀有深刻感悟的群体行动，因而其民族主义的成份与内涵以对祖籍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关怀为指归。这也是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有别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之处。

如果说世界民族主义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即自 18 世纪 60 至 80 年代以来的西方民族主义和自 1918 年一战结束及 1945 年二战结束以来的东方民族主义的话，那么早期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者早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时期便已经在一部分先进人物的导引下，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了西方的民族主义观念，产生了有关民族国家的观念，且在以后的实践中反复体现出其与中国革命相呼应的历程。换言之，近代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发轫及其爱国意识的觉悟是以维持民族存亡为前提，它的存在多半以认同中国、效忠中国，并被居住地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华侨身份的维持为前提条件，属于东方民族主义背景下寻求祖籍国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反抗外来压迫的民族感情的总体现，是激情与正义的产物。这种华人民族主义延续到二战后东南亚各民族国家独立时为止。此后在整个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家关系互信的减弱以及居住国加快了对于华侨的同化步伐而令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渐趋式微，减少了其主、客观生成条件而中断。

但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对立明显下降，相对而言，民族主义因素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错综复杂再次显著上升，表现在各国内部及国家关系之间，或聚合或分离，呈现不同的形态。同样，随着新华侨的出现，特别是在北美、澳大利亚、欧洲、日本等地，一大批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重新接续起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的关系联系，他们再次在海外表达了对于中国的民族感情，形成了冷战后华人跨国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其具体表现在美国华人社会中的如：在国家认同上，支持中国统一，反对国家分裂，维护民族整体利益；在中美两国关系上，促进双方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发展，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在抗议日本霸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海外“保钓运动”行动中，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在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一”国庆纪念活动中，共同表达对于中国和生为中国人的自豪。所有这些现象表明，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特征呈现为：对于中国国际地位的高度关注，也即关注国际关系中民族国家的声望，它是过去反帝、反殖在 20 世纪晚期世界格局中反强权、霸权的延续，目的在于希望中国获得平等的尊重。当然，这种与国内相呼应的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了海外舆论的关注，引发种种猜测，但只要仔细分辨一下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发生的前提和形成的背景，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知道，民族主义的掀起从来是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相关联的，无法凭空而生。它是在外部条件刺激下所激发的一种对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未来反思与再造的愿望和行动，因而有其历史性和时代性。

如果说，冷战后跨国华人作为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复兴的关键载体，其民族复兴的意识和行为不仅表现为积极参与有关中国的政治活动，同时也透过自身的行为选择，永久或暂时地回归中国，并在祖籍国和居住国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的话，^[12]那么，全球化进程在弱化民族国家职能的同时，也在凸显和强化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通过华人散居者的民族意识和文化精神得以凸显。其表现方式：第一种是华人移民在取得居住国永久居留权之后或干脆放弃居留权，回到祖国，致力于促进投资、贸易的经济活动和科技与文化的创新与建设工作。这一批回归中国者被称作“海归派”，他们带动和影响目前尚在居住国欲走还留、举棋不定者的态度和行为。第二种情形是除了直接参与祖国回归运动之外，更有大部分移民在海外保持与祖（籍）国之间的经常性联系。这种联系通过回应祖国政治、参与经济建设、呼吁科技强国和投身社会发展等活动得以维持和拓展。至于更经常性的联系则发生和保持在当地的移民族群中，他们通过社团活动、宗教仪式、家庭联谊、华文教学和文娱节目等形式，致力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嫁接工

所有这些具体的事例和内容，均可见于各种有关华人社会的报道中。

作，旨在促进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了解。这种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致力于维护祖（籍）国文化的根源性努力，体现了华人移民在全球化背景中与时俱进的方向，其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既反应在回归移民的行为、关系架构中，也呈现在域外移民的身体力行中。进而言之，跨国华人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行不悖。

综上所述，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之于中国的意义在于构成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民间“软实力”，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它推动和促进着中国与华人居住国国家关系的沟通、理解、改善与发展，从而为华人跨国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奠定其在居住国的时代内涵。

三、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与居住国的互动

20世纪末期，当全球化浪潮逼近的时候，散居世界各地的各民族种族群体并非如同化论者料想的那样，逐渐消弥于主流社会中不见身影。相反，各移民群体的民族性不但愈加凸显，而且在数量和规模上愈益壮大——通过社会网络的空间分布和社会资本的功能运用，他们在全球各地整合自身文化资源，抵御可能面临的外部压力和社会动荡。同样，一个由华人移民族群所组成的跨国、跨区域的社会文化网络正在悄然形成，它在依循和突破民族国家架构的同时，又在反馈和增进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存共荣。在此背景下，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之于居住国的内容就呈现为：

（一）通过族群联系的跨国性，实现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价值功效。全球化时代，移民群体的跨国性特征体现在一系列有关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行为——关系及其互动方面。就是说，离散者群体有其地点分散的一面，但也有其精神凝聚的一面。这种关系的联系凝聚，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得以实现。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指的是尽可能地建立最广泛而且可适用的社会关系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每一个人作为一个“节点”，连接起其他人，构成网络。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指的是在网络或广泛的社会结构中，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掌握稀有资源的能力以及个人在需要时动员和运用这种资源的能力。它来自于个人关系的网页。^[13]移民问题的跨国主义理论研究特别强调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之于移民个人和群体的意义。因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概念运用，有对移民社会旧有功能概括、提炼的一面，即通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功能运用，安顿初到异地的移民，为之提供安全保障和心理依靠的机制；但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概念创新，为全球化时代的移民个人、群体和祖（籍）国之间的关系找到了民族主义内容的空间表达形式。如今，这种在异域所表现出来的之于祖籍国的社会文化内容，经过全球化的启蒙，成为一种跨国式的族群互动而得到深化和拓展，即“跨国的社会空间”，连接起散居在世界各地具有相同或相似背景的人们，共同致力于祖国的民族主义事业。与此类似，世界性的海外华人社团也在有计划、有目的地通过社会网络的扩大，寻求调用社会资本的能力，以形成规模浩大的海外华人群势力。这些迹象显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功效在于通过不同的地域和相似的文化连接起跨国而居的人们，进而形成移民个人和群体与祖（籍）国相互依赖和彼此支撑的格局。时下，各个地区的海外华人社群时时呼应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就表明了社会网络的规模效应和社会资本的扩展能力。

如果说跨国族群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主要表现为移民在居住国从事有关推动祖籍国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创新和社会进步等一系列事关本民族利益的事情，属于一种跨边界的自外而内、自下而上的变革和触动的话，那么，海外华人的跨国民族主义之于居住国则表现了同样的期待、忠诚和义务。事实上，作为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主要载体的华人社会精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其本身不但对于祖籍国的文化有着深厚的学养，而且对于居住国的文化也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贯通。他们属于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故而能在居住国实现双重的民族主义关怀。以美国华人社会为例，其民族主义活动类型和表现方式可从以下几个层面得到反映：^[14]

1. 经济层面：在居住国，华人移民通过工资工作和自雇工作两种方式，为当地经济建设和发展服务；在跨边界领域，则通过跨国企业、接待来自祖国的经贸代表团以及安排洽谈会等方式，促进居住地和祖籍地双方的投资、贸易。此外，华人移民常常在祖国发生各种自然灾害时积极捐款，帮助故乡同胞渡过难关。

2. 政治层面：在居住国，华人移民参与当地种族动员和居住地的选举活动，并为此进行资金募集和游说活动，表达移民对于居住国的政治认同和身份意识，体现移民对于族群利益、社会关切和政治主张的态度。在跨边界领域，华人移民常常参与有关祖国的政治声援活动，接待和欢迎来自祖国的政治领导人或其他官方代表团，多渠道表达个人和群体之于祖国政府的某些政策改变和期待，以促进国家利益和海外侨民在祖国的利益。

3. 社会—文化层面：在居住国，华人移民参与当地各族裔的庆典活动和居住地的社会—文化事件，表达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理解。在跨边界领域，华人移民通常邀请祖国的艺术家代表团进行表演，参与祖国文化庆祝项目和传统节日庆贺活动，以加强祖国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归属。

显然，海外华人在居住国的思想情感、行为方式，凸显了跨国华人发挥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价值功效，以推进和实现居住地和祖籍地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为两地的民间交往拓展可能的社会空间。这种本土关怀和远程关切的并行不悖，体现了海外华人公民性和族群性的内在统一，具有跨国民族主义的双重特征。

(二) 透过身份意识的离散性，表达多元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内在互动。跨国移民的一个根本特点在于身份意识的离散性。在时空的经纬上，他们是散居者和漂泊者，一方面“无以为家”，没有精神的根源感，四处漂泊；另一方面“处处为家”，欲留还走，时时与这个世界的新近发展取得协调，保持同步。他们是飘零的，但决非无家可归，在心灵和精神上，他们拥有基本的族群价值观和身份意识；只是在地理位置上，这一批人随时在不同地方出现而不特别固定在某一处，他们是具有世界主义新身份的群体。^[15]如果说当代关于华人散居者的概念，更多地是与全球化概念相一致，即认为他们虽有民族国家的根，却没有民族国家的意识或者具有多重民族国家意识的话，那么海外华人的行为表现和精神实质就呈现出一种相应的选择与认同：不断的跨国实践和行为联系，非但没有令海外华人消弥他们的民族国家意识，反倒促成他们具有多元认同和全球意识，并在此框架内维护和推进祖籍国和居住国双边的国家利益。

然而，当今时代，除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之外，对于大多数移居国的政府和人民而言，移民的民族主义内容与居住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之间的冲突更为显著，而不是相反。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移民的文化保持、身份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通常会被视作是对主流文化和同质化的抵抗，特别是当移民文化与移居国的文化差异成为种族分界标志时，主流群体便有可能把移民文化当作原始的、静态的和回归的标志，并把移民的种族共同体视作是一种对主流文化和民族身份的威胁。^[16]因而，当移民在居住国面临社会孤立、社会不公、身份意识、文化冲突等问题时，其所涉及的领域既是地方的、国家的，也是区域的、全球的。而对于移民族群来说，在敌意的环境中，移民文化就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它为移民的身份来源和抵抗排斥与歧视，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支援。同时，移民文化的动力有时能够把族群的历史传统与移民过程的真实情形联系起来，以便移民能够在新的环境中根据经验和需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再创造和再实践，从而客观上为居住国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状态提供更多选择，主观上为抵御外部社会的敌意提供文化和心理的保护机制。^[17]以此而言，当代华人族群身份意识的离散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多元认同和民族意识并存兼容的必需，它有利于华人族群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并为多种文明做出贡献。

(三) 透过猜忌和敌意的现实，认清种族歧视和跨国民族主义的隐忧。尽管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各民族和谐相处最为成功的国家，但毋庸讳言，种族歧视以及“中国威胁论”仍时隐时现，不断地给当地华人抹黑，进而影射中国。1999年“李文和案”后，从事高科技研究的中国留学生

受到很大冲击。一些美国大学的“敏感专业”，在那段时间内不招录中国学生。《考克斯报告》更是把所有到美国求学的中国学生都归为已经或潜在的间谍。毋庸讳言，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对亚裔美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种族歧视，一些人对华裔的忠诚度表示怀疑，并且相信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所有美籍华人都会站在中国一方。于是，华裔的名声越来越多地与“威胁美国安全”划上了等号。^[18]这种不信任所导致的一个负面结果可能是华人族群民族主义的反弹和公民民族主义的削弱，不利于居住国本身国民身份认同的凝聚。

事实上，种族歧视固然是一个顽疾，威胁着一国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逐步崛起，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隐忧以及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与中国的呼应，令一些政客找到了攻击中国的口实，也令一些民众产生联想和猜忌。它也说明，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之于居住国的问题，事关如何协调地方认同和全球意识、族群身份和世界主义的话题。也就是说，如何协调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与跨国主义的矛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四、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可能模式和局限

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提示人们考虑其之于国家、地区和全球的可能模式及其基本局限。

首先，本土回归运动表达华人民族主义之于国家发展的根本宗旨。在移民研究理论中，“本土回归运动”指的是，接受了西方社会价值理念的一部分移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对祖籍地施加影响，以达到祖国改造与改进计划的目的。众所周知，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杰出代表是20世纪初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他一生致力于祖国的民族主义觉醒运动，其政治团体在促进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此外，他团结了大多数海外华侨来帮助他的革命事业，虽然并不是所有华侨都会回归，但他们的确参与了回归运动，共同创立了中华民国。

在移民“本土回归”的政治参与之外，其他类型的“本土回归”运动，特别是经济类型的参与与活动，也透过移民网络的构建得以展开和实现。在这一进程中，移民输出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看到了移民之于本土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和拓展这种全球化的资源为国家建设服务，以鼓励和吸引他们的海外“公民”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因而，从经济建设角度看海外移民的本土回归运动，就成为一种移民群体和祖（籍）国政府的双向选择和共同意愿。进一步地说，正是输出国政府在致力于促成移民的“本土回归运动”，特别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拥有技术、知识和资金的海外移民来共同参与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民族国家并不总是跨国互动的消极者、被动者，它可以促进跨国互动，也可以阻止跨国互动。因之，政府对于移民回归的积极姿态，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政策选择，即国家不能直接强制自身领土之外公民的经济参与活动，所以移民输出国政府日益调用跨越国家边界的民族团结意识，以鼓励海外移民汇款和投资。国家开展民族主义的语言，恰好因为移民在国家领土边界之外，但却在想象的共同体之内。^[19]

其次，跨国或跨边界的远程关怀体现了华人民族主义的区域互动。如今，参与祖国政治的“本土回归”运动在散居者中更为常见，也就是说，“祖国政治”在以多种方式吸引着离散者和跨国共同体成员关心、过问和干预。这种离散者、祖国政治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跨国的

跨国移民社会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在移民寄回国内家庭和社区的汇款方面。据估计，目前全球移民汇款的数额每年超过600亿美元，而这正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寻求的资源。Steven Vertovec, "Transnational social formations: Towards conceptual crossfertiliz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une 30-July 1, 2001. Princeton University, WPTC-01 - 16.

政治活动和强化联系正在许多方面创造出“去边界化的”民族国家。^[20]许多现象表明，一些国家的政党现在经常在海外建立办公室，以争取侨民的选票；而离散者自己也组织起游说祖国政府的活动，以对现有的政党和政治走向施加影响。而人员流动、通讯技术、电影电视、卫星电视与因特网的高度发达均为跨地区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和不满抗争提供了多种表达方式。通过电子媒体，祖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把世界各地的海外移民联系起来，令移民社区能够在居住地发展出远程关怀。这样，移民的社会空间，伴随着法律、政治和文化衍生的多样化，不仅仅是实践和意义的多样化，而且也是地点的多样化。一些分析家据此认为，跨国主义改变着人们之间的行为和关系，空间被创造成“社会场”，它连接和安置那些居住在不同国家的参与者。故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分离困境（诸如领土、集体、社会行动），人们产生出一种新的“跨地方”（translocalities）的虚拟的邻里关系的愿望。在这个情景中，“地方”——作为一种感知结构、生命特性和居住共同体的意识形态，由电子媒体的压力而促成。^[21]可以预料，全球化时代，祖国政治对于离散者的意义正在变得具体、切实，而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立场与关怀，其连动效应和辐射能力已凝聚起散居者的政治表达，并形成跨国和跨地区的社会压力，不容忽视。这种华人跨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体现了当代移民跨越时空的互动能力。

第三，多元认同和双重效忠预示着华人民族主义的一种趋向。值得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移民跨国实践都是政治性的，或者单纯是以祖籍国为指向的。人们或许可以想知，当杰出的华裔学者面对不同种族和肤色的学生，在西方的讲坛上用流利的英文讲授儒家学说的时候，其实践的意义在移居地，而非祖籍国，其关怀的指向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而非狭隘的此时或彼地。可以说，他们是在用自己丰厚的学养来传播东方文明的信息，并希望以此和西方文明作沟通、对话与交流，熏陶出更多胸怀博大的年轻人。这一批华裔学者的学术关怀和价值理念在居住地是启蒙性的，但正是凭借着他们的使命承担和身体力行，令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的兴趣、了解和研究在逐步扩展，他们和西方的汉学家以及所有关心中国事务的西方学人一起，共同致力于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工作。确切地说，他们在把东亚“地方知识”推广到全球意识中去的时候，其所体现的多元认同和双重效忠，令他们把两种文明同时反馈到各自的世界中去：向西方人讲授东方文明，向东方人引进西方文明，从而在文化层面上把族群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的矛盾统一了起来，凸显跨国主义对于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的正面意义。

事实上，关于多重公民身份（Multiple citizenship）观念的扩散，要求人们能够在不同层面上（国家、区域和全球）理解多种行为选择和关系制度的可能模式。同时，人们亦相信，多重身份，并不意味着普遍认同和共同价值观的缺失。当越来越多的移民共同体远离家乡，并同时认同祖（籍）国和居住国文化时，他们已经在对文化交流和文化共享产生着重要的转型性影响，特别是一些精英人物，他们在全球接受教育，活跃在各个领域，并在全球层次上发生彼此之间的联系。正是这种情形，决定了他们既不为任何特殊政体所代表也不对任何特殊政体负责，他们促使人们意识到全球整合和全球管理的必要性问题。^[22]多元认同和双重效忠为全球化时代移民个人和群体找到了世界主义的认知途径。

由上观之，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与二战前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和必须界定的范围。进一步说，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时空比较，牵涉到历史与当代的时段解读以及北美与东南亚地理区位的不同。这种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制肘和局限仍然涉及华人与居住国和中国的关系。

1. 主体：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主体已从二战前的以华商和中下阶层的劳动者为主转

如移民希望能够在多个国家维持和获得健康、福利、财产权、投票权和公民身份（世界上大约有一半国家承认双重国籍）之类的权益。

向以拥有知识、技术和资金的新华侨华人和华商为主。

2. 范围：从地域上看，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范围已从二战前遍及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北美和东南亚两大板块）各主要华人社区的广泛动员，限定到目前以欧美社会（西欧和北美两大板块）为特定区域的思潮与行动，尤以新移民流入较为集中、居住国民族政策相对宽松的北美地区为主，而与东南亚国家无涉。

3. 规模：由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主体以新华侨华人为体现，发生地区以欧美发达国家为范围，这就决定了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可以动员的力量有其限定性，人数规模不会过于庞大。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华人传统民族主义和跨国民族主义的区别在于：传统民族主义的主体包括了华侨下、中、上阶层中不同群体的最大部分成员，共同致力于祖国——中国的民族复兴和解放事业，其情感依赖和行为目标指向明确而单一，其关系特征通过他们与中国的积极互动而实现，以及中国政府对于他们的期待而得以落实和加强（如号召华侨出钱、出力等等），它是冷战以前人们理解和接纳的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至于海外华人的跨国民族主义，其主体是华族社会中的一部分知识精英，这一群体虽然会逐渐扩大，但目前还没有达到可以被广泛动员的程度，他们的情感指归和行为目标倾向于在出生地和居住地之间游走、互动，即通过因特网和空中旅行来加强和扩展他们的社会网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与祖籍国—居住国的关系时而松散，时而紧密，但很难区分或割舍他们对于其中任何一地的感情联系。

就此来看，冷战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主体、地域和人数都决定了其表现方式的基本局限，即作为居住国的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指的是以新移民群体为主的华人，对于中国—居住国—世界相互关系的一种富于理性和建设性的介入，其行为表现、关系类型和制度特征均具有连接彼此、反馈双方的跨国性特征。这种华人跨国民族主义是和平的力量，理性的行动，伴有激情和正义。

五、结语

时代在发展，世界更开放。海外华人在不断的出国—返国—再出国的循环中，其“世界公民”的意识在增长，但其“民族意识”并不因此而削弱。相反，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达得更为充分。对此，王赓武教授曾预言，在“21世纪，仍然会有华侨、华人、华裔之别，他们会根据自己对民族主义的不同看法，决定选择不同的去向”。^[23]但有一点似不必存疑，那便是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虽不代表海外华人社会的总体走向，却是国际关系中一股相当引人瞩目的力量。它是继20世纪初（辛亥革命）、中期（抗日战争）之后所出现的世纪之交的第三波海外华人民族主义浪潮。这股势力的发展走向，取决于华人族群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融合的程度。只有当这种融合日趋深入的时候，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才会有展现的舞台和被容纳的空间；反之，如果这种融合远不足够，甚至引发与居住国的民族矛盾与冲突的话，那么华人民族主义就会朝两个方向演变：或趋于萎缩——淹没在主流社会的认同中，不事声张；或趋于高昂——爆发出新的力量，更加激烈而直接回到祖国。所有这些情景，将取决于居住国对于移民多元政治认同的态度。只有不把它视作是对本国政治身份认同的威胁，这种跨国民族主义才能发展。迄今，唯一能够提供给各族裔移民多种认同的美国，已经对于日益多元化的身份意识变得愈加敏感和不安。^[24]就此角度而言，华人民族主义的跨国性，是一个需要与全球化步骤相协调的过程。换言之，在世界体系依然是民族国家主导的时代，跨国的民族主义力量正在令一些移民接受国的政府官员、公众、传媒怀疑和渲染移民社群背后的祖国力量和移民输出国的政府企图。故而，如何把握好华人民族主义发挥的尺度，首先必须取决于华人移民共同体对于居住国发展的根本贡献、政经力量及其与多民族种族社会融合的程度，即把跨国主义的族群性内容融入到民族主义的公民性实践中，而不是相反。

[注释]

- [1] See Linda G. Basch , Nina Glick Schillier and Christina Blanc-Szanton , *Nation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anghorne , PA : Gordon and Breach , 1994 , p. 9 ; Alejandro Portes , Luis E. Guarnizo and Patricia Landolt , The Study of Transnationalism: Pitfalls and Promise of an Emergent Research Field.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 Vol. 22 , No. 2 , 1999 , pp. 217 - 237.
- [2] Martin Albrow , Frame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Transnational Studies , Paper delivered to the ESRC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Programmer Seminar in the Faculty of Anthropology and Geography , University of Oxford , 8th May 1998. WPTC - 98 - 02.
- [3] [美]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327、337-338页。
- [4] [5] 王联:《民族问题与当前国际政治态势》,北京:《当代世界》1999年第10期,第18页。
- [6] David Fitzgerald , Locating the National and Local in ' Transnationalis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os Angeles. Presented at the UCLA Second Annual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Race , Ethnicity , and Immigration. May 28 , 2002.
- [7] 阿尔伯特·马蒂尼利:《市场、政府、共同体与全球管理》,北京:《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18页。
- [8] 戴晓东:《浅析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第60页。
- [9] 单纯:《论中国人的“天下民族主义”》,《世界民族》2001年第2期,第12页。
- [10] 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年8月16、17、18、19日。
- [11] 陈晓律、李永刚:《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开封:《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第65-69页。
- [12]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4页。
- [13] Steven Vertovec , Transnational social formations: Towards conceptual crossfertiliz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June 30-July 1 , 2001 , Princeton University , WPTC - 01 - 16.
- [14] See Alejandro Portes , William Haller , Luis E. Guarnizo ,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The Emerg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an Alternative Form of Immigrant Economic Adaptation. February 2001 , WPTC - 01 - 05.
- [15] 陈国贲:《失根、寻根、重根——反思海外华人世界主义新身份》,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9年10月14日。
- [16] [17]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 *The Age of Migration*. Third Edition.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The Guilford Press , 2003 , p. 39.
- [18] 《美国制造“中国情报恐慌”》,和讯网 <http://www.homeway.com.cn>. 2005年2月25日。
- [19] David Fitzgerald , Locating the National and Local in ' Transnationalism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Los Angeles , Presented at the UCLA Second Annual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Race , Ethnicity , and Immigration , May 28 , 2002.
- [20] [21] Steven Vertovec , Conceiv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nationalism ,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 Vol. 22 , No. 2 (1999) <http://www.transcomm.ox.ac.uk> , 2002年9月。
- [22] 阿尔伯特·马蒂尼利:《市场、政府、共同体与全球管理》,《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15页。
- [23] 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年8月16、17、18、19日。
- [24] [美]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译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